

東漢知識份子的流離與認同 ——以班彪、王粲、蔡琰為例

何 雅 雯*

摘 要

知識份子面對國故鼎新、時移勢易的變局，並非簡單的忠與不忠二元抉擇，其間有生死交關、出處進退等複雜的取捨糾葛。本文觀察時間略具先後、處境間有異同、性別互相對照的班彪、王粲、蔡琰三人，取其紀行之作為例，觀察動亂中的知識份子，如何面對現實處境、形塑認同歸趨，並如何在離鄉或返鄉的遊旅途中，藉由對外在人事物的理解與描繪，展開自我詮釋。他們表現出知識份子的三種形式與三種選擇，也是中國知識份子面對認同問題時的三種基本模式。

關鍵詞：知識份子、紀行、仕隱、出處進退

*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shizuku.ho@gmail.com)

投稿日期：101.10.01；接受刊登日期：101.11.22；最後修訂日期：101.12.20

The Exile and Identity of Intellectuals in East-Han Dynasty: On Ban Biao, Wang Can and Cai Yan

Ya-wen He*

Abstract

When the intellectuals have no choice but face the decline and destruction of their own country, they have to do some complicated choices concerning survival, career and moral courage. This paper focuses on Ban Biao, Wang Can and Cai Yan. The times, in which they lived, as well as the situations they found themselves in and their genders, all these are generally different, despite some similariti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re dealt with: how do they confront his/her own reality, establish the intention of identity? Furthermore, in the way away from/return home, how do they develop their self-interpretations by the realiz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people, things and events they encounter and experience? In short, they displayed three patterns and choices of the intellectuals which are the basic mod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llectuals facing the problems of identity.

Keywords: intellectuals, journey, travel, being an Official or being an Recluse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ceived October 1, 2012; accepted November 22, 2012; last revised December 20, 2012

壹、前言

考察中國歷史上「知識份子」、「士」階層之形成，其始在於孔子（551-479 B.C.）以六藝教，將貴族特有的王官之學擴及於社會的各個層面，使凡能「自行束脩以上者」都有獲得知識（尤其特指參與政治與文化事務之知識）的機會，遂有春秋戰國之世的眾多游士，以此參贊各國朝政。此一發展大致有兩點意義值得重視。第一，此後歷朝評量和任用知識份子的途徑不外乎所謂的孔門四科：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察舉或科舉等等實際的舉用制度容或有異，但是無論是制度中標舉的考核項目，或者制度之外對士人的評價方式，大體皆可以此四項涵括。第二，知識份子成為一個特殊階層，除了具有特殊社會背景的少數時代之外，不論出身貴賤，亦不論是否實際擔任行政職務，六藝之學作為一種特定的文化教養，都使得受到教養的人們成為知識份子階層的一員。因此，中國的知識份子與政治、文化的事件和活動始終維持密不可分的關係，一方面作為這些事件和活動的主體，一方面也深受這些事件和活動影響，大環境的變遷隨時牽動著知識份子的生活與思維；其中，影響最為深鉅的，可能是因戰亂而起的社會動盪。

對中國知識份子而言，個人在仕途上的遇與不遇，當然是其生命的價值所在，一旦不遇，或者遭貶謫、或者自行歸隱，都是人生價值的選擇。「仕」與「隱」固然是一個難以迴避的問題，面對此一問題所做的抉擇也正表現了個人的自我認同，然而，如何仕、如何隱，畢竟是知識份子可以選擇的，甚至於人生何以走向必須面對仕與隱的選擇，也是因為知識份子在此之前已經做了形形色色的其他選擇。相較之下，「戰爭」卻是一個時代必須以其整體社會承擔的共同厄運，知識份子也和庶民百姓一樣，在戰亂裡流離失所，無可選擇地經歷了實質的苦難。尤其，一旦

因為戰亂而亡家破國，甚至淪為異族統治，則向來參與政治、傳承文化的知識份子，亦不得不面臨認同的困境，此中如何堅持？如何轉移？他們要如何在文句的連綴中傳達此一困境，如何陳述表白，說明抉擇的根由？唯有在解決了這些問題之後，知識份子才能在接下來的新時期裡重新進行「仕」與「隱」的個人抉擇。

知識份子在時移事異、國故鼎新之際的堅持或轉移，當然可以從各朝遺民的行動和創作進行討論；知識份子在戰亂中的典範，當然首推杜甫（712-770）的〈三吏〉、〈三別〉或〈北征〉。然而，杜甫其實沒有認同的問題，他對唐王室的忠誠與對黎民的關切始終如一，是一個動人的典範，卻難以作為認同問題的討論對象。至於各遺民文人，廣義來看可以上溯至屈原（340-278 B.C.），若以所逢戰亂牽連之廣、以及因為戰亂而流離他方作為取樣的標準，則兩漢之間的更始之亂以及東漢末年黃巾、董卓之亂，可以說是中國從長治久安的統一帝國邁向全面崩潰、瓦解之先例。因此，本文以兩漢之間的班彪（3-54）〈北征賦〉與東漢末王粲（177-217）〈初征賦〉、蔡琰（177?-239?）〈悲憤詩〉為主要範圍，觀察知識份子在戰亂中的流離和歸返。

亂世災殃，身罹所苦者多，但此三人對照，正可顯示出不同典型。班彪和王粲雖皆為亂世之知識份子，但班彪身在兩漢迭代之際，漢室興復雖遠，但天下仍望劉氏；王粲身處東漢末世，漢室衰頹已成定局，二人的選擇與自我認知可能展現知識份子權衡取捨的外在因素。相對於班、王，蔡琰的女性身分已使其選擇更加複雜困難，更有甚者，她所面對的不只是朝代更迭，更有胡漢殊俗的巨大斷裂。此三人的位置、處境、相應之道，正有助於我們觀察知識份子的抉擇，從來都不是理所當然的。本文的討論重心不在於知識份子針對戰亂的鋪敘描寫，亦不在於國破家亡的黍離麥秀之悲，而將焦點放在戰亂造成的流離情境與認同歸趨，以

及，辨識出認同歸趨之後，更觀察他們如何藉著敘說流離往返之途以陳述、表白認同過程，他們如何面對此一過程？如何選擇或適應其結果？

貳、現實處境：戰亂流離與認同歸趨

首先，我們可以對班彪、王粲、蔡琰的離亂經歷與認同歸趨進行粗略的觀察。三人皆經戰亂，因而主動或被動地由京城流離他鄉，此「他鄉」相對於平日生活的固定環境，相對於代表政治權力與文化中心的京城，亦且更徹底地因為戰亂而隸屬於另一個與京城對立的政權。同時，三人在流離他方之後，終究又回到京城故國，昔日的京城如今建立了穩固的新政權¹，三人在此一政治、文化圈中的位置也因為過去的離亂經歷而有所改變。

史載班彪「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眾天水，彪乃避難從之。」²〈北征賦〉的內容，即是避難天水途中所見與所感。《後漢書》中，〈班彪列傳〉對班彪西附隗囂（?-33 A.D.）之途沒有任何記載，卻以隗囂與班彪的對談直接點出兩人相異的政治立場：

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
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漢……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

¹ 王粲、蔡琰回到中原時，曹操（155-220）挾天子以令諸侯，漢室早已名存實亡。當時曹操雖未統一天下，然而畢竟領有北方，堪稱三國中的第一強權，以之為一個不同於東漢的新政權，並不為過。

² 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1977年），頁1323。

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³

隗囂意欲爭逐天下，無論是如同戰國的群雄割據，或者重新統一天下，總之試圖建立自己的疆域和政權。班彪卻說「百姓謳吟，思仰漢德」，言之不合，於是避地河西，為河西大將軍竇融（16 B.C-62 A.D.）從事，「畫策事漢，總西河以拒隗囂」⁴，最終亦隨竇融返抵京師。於是，班彪從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離開京師，西投隗囂，背後漸漸遠去的東方、京師，並非自己所認同的政權，而前途茫茫，此行的終點雖然較京師和平，然而是否繼承或扶持班彪所認同的漢政權，懷念不已的漢帝國能否重生，皆未可知。當他到達天水，隗囂對漢帝國全無留戀懷想，試圖自立，對班彪而言，已然形同一個與漢敵對的「異國」。

再考察班彪隨竇融還京之後的其他著作，可以發現，班彪在隗囂、竇融之間的選擇，有其一貫的歷史傳承的立場。不但在《史記》之後「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⁵，並且於辟司徒玉況（?-51 A.D.）府時，上言選置東宮及諸王國官屬，認為「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缺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⁶班彪重視皇室繼承人的教育，舉周成王（1042-1021 B.C.）年幼時即有周公（生卒年不詳）、邵公（生卒年不詳）、太史佚（生卒年不詳）、

³ 范曄，《後漢書》，頁 1323-1324。

⁴ 范曄，《後漢書》，頁 1324。

⁵ 范曄，《後漢書》，頁 1324。

⁶ 范曄，《後漢書》，頁 1328。

大顛（生卒年不詳）、閔夭（生卒年不詳）、南宮括（生卒年不詳）、散宜生（生卒年不詳）共同輔佐伴隨，「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⁷為例，將天下治亂繫於君王的培養教育與王佐之臣的選擇上。由此看來，班彪不但是「思仰漢德」，希望在亂世中恢復漢家基業，同時更希望此一基業得以綿延久長，並以實際的文章政論履行「士」的責任。⁸

兩漢為中國史上少見的大一統盛世，君權較諸以往大為提高，知識份子已然逐漸步入完整穩固的文官系統，同時，兩漢之間雖有新莽，然歷時未久，且政權交替的戰亂前後，政權皆屬劉氏，實力相當，不若兩宋之南宋偏安江南。班彪之認同於光武政權，其實可以說是為了復興漢室，無論光武帝劉秀（25-57）是否確為漢家之後，班彪所重視的是過去的正統政權能夠延續，「漢」這個象徵符號能夠再度回到國家的頂端。由西漢入東漢，不是朝代的更迭，而是已覆滅之故國的再生。相較之下，王粲與蔡琰面臨東漢末世，政治局勢大不相同，漢室之亡已成定局，他們必須思考的是，要選擇繼承漢家血統卻無政治實力的劉表（142-208），或者篡奪漢家政權、但是力量鞏固強大的曹操（155-220）？班彪對漢室矢志不忘，其認同並未轉移，故而可以踐履他的知識份子本分，然而王粲和蔡琰卻不得不重新考慮他們的知識份子身分，為自己尋求另一定位。

王粲為世家子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⁹，並且以捷才、彊記著名。《三國志》並載其仕宦之途：

⁷ 范曄，《後漢書》，頁 1328。

⁸ 《後漢書》亦於其傳中提及班彪「性沈重好古」、「才高而好述作」，「後察司徒廉為望都長，吏民愛之」，加上以言語諫隗囂、上書論政事、續傳漢代遺史等事蹟，幾乎可說是符合孔門四科的教育理想。

⁹ 陳壽，《三國志·魏書·王衛二劉傳傳》（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頁 597。

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眾，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俊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恆典之。¹⁰

可以發現，王粲所關注的問題與班彪截然不同。班彪以歷史說明朝代興亡，勸諫隗囂，王粲則強化了統治者對人才的舉用，認為這才是盛衰的關鍵。袁紹（?-202）、劉表、曹操的勢力消長，原因都在於用人：袁紹好賢而不能用，劉表有賢而不知所任，曹操卻能收其豪傑而用之。於是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王粲有機會任黃門侍郎，卻以西京擾亂不就，在有皇權的劉氏與一方州牧的劉氏之間選擇荊州依劉表，原因何在？繼而勸劉琮（生卒年不詳）以荊州歸曹操，又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王粲既以少年博學為蔡邕（133-192）所重，他的幾次選擇，顯然也都以才學是否見用為考量。西京之擾亂可由王粲〈七哀詩〉之「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得知，在這種情形下，縱使赴任就職，其才學也無由施展。相較於西京之亂，劉表「雍容荊楚」，確實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去處，然而劉表

¹⁰ 陳壽，《三國志·魏書·王衛二劉傳傳》，頁 597-598。

以王粲貌寢通佻遂輕視不用，對王粲而言，政治實力足夠、又能求才用人的，只剩下「唯才是舉」的曹操了¹¹。

若再比較王粲〈登樓賦〉所云：「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雖然以懷土思歸為人情之常，無涉於窮達，然而此語已然可見王粲在荊州時確有不遇之感。對王粲來說，漢末亂世，漢室早已沒有復興之望，於是在新舊政權之間的認同取捨，遂與其歷史正統性無關。身為亂世文人，所求只在最終的和平與個人的「見用」，因此，政治勢力與用人方式成為他最重要的選擇依據。《三國志》裴松之（372-451）注曾引《文士傳》所載，王粲以曹操連破袁紹、孫權（182-252）、劉備（161-223）、烏丸，「今將軍自度，何如曹公邪？」勸說劉琮「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才能「保己全宗，長享福祚」。雖然裴注也隨即反駁此說不可據，曹操征荊州遠在破孫權、劉備之前，破烏丸事亦與白登一地無關，然而這條記載可能反映了時人對王粲的理解。既然以文才名世，缺乏武略，自然必須投奔已有強盛武力、可以開始進行經營典章制度的政治勢力。〈初征賦〉所寫應為由荊州北歸至譙之途¹²，這一段旅程等於宣告了王粲終於返回政治

¹¹ 按曹操下求賢令在建安十五年（210 A.D.）春，而劉琮降曹操在建安十三年（208 A.D.），下令之時，王粲應已歸曹。然而曹操之用人唯才，兵多將廣，當屬歷年經營之功。求才令雖下於建安十五年，但此一理念其實自始有之，也涉及曹操對自己的政權未能恪守君臣禮法的固有道德、而有篡奪挾持之嫌的體認，於是，以德行自任的知識份子必然不肯歸曹。王粲於漢濱奉觴祝賀之詞，可以視為曹氏陣營的共識，或許也可以進一步推論，這很可能是君臣之間的互相激引，是針對曹氏政權的具體需要而來。

¹² 亦有說作於建安十四年（209 A.D.），王粲隨曹操由譙至合肥，十二月還譙途中，例如吳云、唐紹忠即主此說，云「（建安十四年）自春至冬曹軍均在征戰之途，王粲隨曹往還，故有此作。賦中有對春夏的描寫，因有佚文，對秋冬之景有無描寫尚難確定；然而可以肯定此賦非春季所作，當是夏後之作」。吳云、唐紹忠，《王粲集注》（河南：中州書畫社，1984年）。然而就〈初征賦〉內文，乃是由南往北，由春入夏，據《三國志》所載，曹軍秋七月至合肥，十二月北還至譙，兩者似有不合。又據吳云、唐紹忠所繫王粲年表，建安十三年歸曹之後，是年十二月隨曹操征劉備，敗於赤壁，十四年三月

的核心，他所認同的政權和國家就在視線與路途的正前方，因而對未來充滿希望，與班彪〈北征賦〉的惶惑傷痛全然相反。

至於蔡琰的離亂經歷，遠比班彪、王粲更加曲折，其認同歸趨也迭生變化。可以說，班彪與王粲都有一個確定不移的認同對象與標準，然而對蔡琰而言，被擄、入胡、生子、別子、歸漢、重嫁的經歷，使得一個固定的認同對象、固定的認同標準可能變得荒謬無稽。蔡瑜先生即曾指出：「經歷邊塞文化洗禮的蔡琰已不是原先的蔡琰，再回歸漢族實仍不能免於成為他者的命運。這是在胡漢社會都存在的種族與階級的互動關係，從而形成身分認同的落差。」¹³並從性別角度討論蔡琰歸漢的結果不過是拋夫別子、一無所有，原有的階級位置一再下降，「身為女子，無論在那一個文化或政權下，除了孑然一身外，是不能真正擁有什麼的。而此一身還受著重重的限制，那麼認同任何的價值觀可曾比珍惜一己的有用之身更實在的嗎？」¹³蔡瑜先生此文已就蔡琰生平、〈悲憤詩〉及後世文人的評價與接受角度討論蔡琰的身分認同問題，本文不再贅述。必須補充的是，此一「身分認同」其實包含兩個層面，亦即政治與文化認同，相較於班彪、王粲之以政治認同為核心問題，蔡琰則更偏向文化認同的討論，首要原因當然在於蔡琰的北往南歸，跨越的不只是相異的政權，更是兩種徹底相違的民族文化。

索羅爾（Werner Sollors）指出：

隨曹操至譙、七月入淮水。既然一年之內兩度向北至譙，年表云〈初征賦〉「可暫繫於是年」，則不必然作於是年年底第二次由合肥還譙，而可能是年初這一次，與賦中所寫的季节較為符合。

¹³ 蔡瑜，〈離亂經歷與身分認同——蔡琰的悲憤交響曲〉，性別／文學研究會主編，《古典文學與性別研究》（臺北：里仁，1997年），頁84-85。

給「族群」本身下定義意義不大，因為它並不是指某個物自身，而是指一種關係：族群通常以對比為基礎。……種族、人種（racial）、和民族特徵建立在對比、否定的基礎上，或建立在種族心理學者德弗羅（Georges Devereux）所稱的「疏離」（dissociative）特徵之上。¹⁴

對中國傳統士大夫來說，胡漢、華夷之分往往明確嚴格，尤其強調文化上的差異，對於當代後殖民論述中努力要打破的血統、膚色等天生差異所造成的區別，反而可以通融，自孔子以來即已根據文化禮俗進行族群的對比和區隔。因之，蔡琰雖為道道地地的漢人，卻因為胡地生活的經驗、為胡人育有二子，而被視為華夏之外的另一族群，故〈悲憤詩〉所謂「流離成鄙賤」，關鍵可能不在於「一女不事二夫」之「女性」的貞節觀念，而是對知識份子的要求，不能一死全德，又不能如蘇武持節不屈，反而還接受了胡人的生活方式，加入胡人的人倫家庭，故而淪為鄙賤的異族文化成員。

由此衍伸出來的問題是，蔡琰是否可以被視為漢代的知識份子？孫康宜〈末代才女的「亂離」詩〉指出，「儘管蔡琰被奉為撰寫離亂經驗的楷模，受到不少男性詩人的讚揚，但歷代的女詩人卻少有人自覺地模仿蔡琰的詩風。一般說來，傳統女詩人作品大都局限於閨怨的狹隘內容，因為她們大都缺乏自覺的歷史意識和政治關懷，故很少寫詩見證政治與社會的興亡盛衰。」¹⁵蔡瑜先生亦針對朱熹對〈悲憤詩〉的批判提出質疑，蔡琰「為什麼『應該』認同士人的價值觀，因為『士』向來就是男子的

¹⁴ 維爾納·索羅爾（Werner Sollors），〈族群〉，弗蘭克·蘭特里夏（Frank Lentricchia）、托馬斯·麥克勞林（Thomas McLaughlin）編，張京媛等譯，《文學批評術語》（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395。

¹⁵ 孫康宜，《文學的聲音》（臺北：三民書局，2001年），頁43。

身分認同，自有其一套內聖外王的系統，『士』的身分可以成就的，女子都不能，為何獨獨能在死節這一關相求？」¹⁶從以上兩種似乎略有矛盾的意見中，我們或許可以推論，蔡琰本來不見得意識到「女性」與「知識份子」兩種身分的對立，本來具有知識份子的自我認同，是在胡漢兩地、兩種文化的拉扯中，放下了傳統知識份子的價值觀，才會發展出複雜的身分認同。《後漢書·列女傳》載：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¹⁷

此處對蔡琰形象的刻畫，首先看重她的「博學有才辯」、「妙解音律」，與當時士人如其父蔡邕等並無二致。蔡琰得以進入史傳，憑藉的正是這種與當時士大夫的相同之處，對作史的范曄（398-445）來說，值得肯定的不是她具備女子的德、容、言、功四德，而是她的才能已經符合「士」的標準。其後寫蔡琰為董祀（生卒年不詳）請罪求命，「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為改容」¹⁸，對答之際已有遊士縱橫的氣概與謀略；復舉男女有別，而拒絕曹操所遣十吏，親自誦憶繕寫舊籍四百餘篇，不但肯定其才學，亦且點出歸漢之後對漢家禮法的尊重。蔡瑜先生指出，「此二事都在證成蔡琰才女的形象」¹⁹，然而，其中形象與

¹⁶ 蔡瑜，〈離亂經歷與身分認同——蔡琰的悲憤交響曲〉，性別／文學研究會主編，《古典文學與性別研究》，頁 92。

¹⁷ 范曄，《後漢書》，頁 2800。

¹⁸ 范曄，《後漢書》，頁 2800。

¹⁹ 蔡瑜，〈離亂經歷與身分認同——蔡琰的悲憤交響曲〉，性別／文學研究會主編，《古典文學與性別研究》，頁 87。

才子士人實無不同。對女性的肯定，所採取的不是女性之所以為女性、之所以不同於男性的特殊價值，反而正在於女性和男性知識份子的相同之處。所以，至少對史家而言，蔡琰是一個進入士人共同文化語境的人物。

因此，我們重新思考蔡琰的文化認同問題，仍然承認這是複雜委曲的，然而可能不只是拋下一切認同的掙扎、回歸生與死之基本層面而已。蔡琰在胡期間，始終難以真正適應胡地生活，回到中原之後，對胡地的回顧則充滿了解與寬容²⁰。而史傳中蔡琰之嚴守男女大防，豈不正是遵守了漢人的文化原則？換言之，在離亂經歷中，蔡琰首先求生命的保障，一旦生命無虞，則入境隨俗，接受當下的文化模式。接受並順應所處之地的文化和習俗，當然不足以代表認同此一文化。當蔡琰歸漢之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將一切經歷框限在「歸漢的蔡琰」的回憶與視野之內，楚辭體中的胡地腥羶駭人，五言體中則「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畢竟缺乏漢人視為文化重心的「義理」，讓她念念不忘的始終是從此失去母親的幼子。擁有天倫回憶的是普遍被視為蠻夷的胡地，蔡琰對其文化的態度從驚駭到寬容，畢竟未曾認同；而再無任何骨肉至親的中原，卻有她必須竭心勗勵的義理與文化。血緣和文化的拉鋸中，無論蔡琰是否有自主選擇的權力，她的言行舉止都在盡力配合當下環境的要求。於是，蔡琰在流離的途中與流離的終點處，始終處於當下的邊緣位置：在胡地時因為不能認同其文化而位居文化邊緣，歸漢以後又因為認同此一文化，更深刻地意識到自己「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的邊緣位置。

相對於班彪、王粲，在亂離結束之後，不但歸返地理上的中心，也同時加入政治的中心，蔡琰在歸返之後，卻因自覺鄙賤而認為自己可能不再屬於受到尊重的知識份子群體，由「常恐復捐廢」可見，她畢竟認

²⁰ 下文將會就〈悲憤詩〉二章進一步對此進行討論。

同漢家文化，因而格外害怕自己被排拒在外。所懷「終年歲」之「憂」，其實包括了對過往一切的必須承擔，以及對未來的難以預測。然而，也正因為對邊緣位置的意識，使蔡琰得以擺脫知識份子議論時事不得不遵循的格局，不必存有任何預設的政治立場，在五言體〈悲憤詩〉中，客觀地以「漢季」一詞承認漢王室名存實亡，不但嚴詞批判董卓之「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並隱隱指出所謂「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才是造成烽火四起、生民塗炭的導火線。於是，蔡琰雖然放下了傳統知識份子的自我意識，以生死為大、甘於處身文化邊緣，卻仍然保有漢人的文化認同，並且被史傳認可為知識份子族群的一員。她雖然不再以知識份子自我期許，然而，這種多視角的批判方式與批判能力，竟隱隱然符合了當代對知識份子的討論。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云：

.....知識份子一直受困於忠誠這個問題，及其無情的挑戰。我們所有人毫無例外地都屬於某個國族、宗教或族裔社群，不管多麼高聲抗議，都無法超越聯繫個人與家庭、社群、(當然也包括)國籍的有機關係。.....我們奮戰只是為了擺脫殖民主義(這是一個必要的目標)?還是考慮到最後一名白人警察離去時，我們要做什麼?²¹

蔡琰亦有「忠誠」的困擾，同時難以超越種種區分群體的人為關係，她的掙扎可能不是為了擺脫各種權力的限制，也不只是在求取一個單一的、固定的認同。薩氏亦對「當最後一個白人警察離去時，我們要做什麼?」的問題，以〈知識份子的流亡——放逐者與邊緣人〉一章提出看法，無論是否實際流亡在外，知識份子都是流亡者：

²¹ 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臺北：麥田，1997年），頁76-77。

……流亡有時可以提供不同的生活安排，以及觀看事物的奇異角度；這些使得知識份子的行業有生氣，但未必減輕每一種焦慮或苦澀的孤寂感。流亡這種狀態把知識份子刻畫成處於特權、權力、如歸感這種安適自在之外的邊緣人物……

因為流亡者同時以拋在背後的事物以及此時此地的實況這兩種方式來看事情，所以有著雙重視角 (double perspective)，從不以孤立的方式來看事情。新國度的一情一景必然引他聯想到舊國度的一情一景。就知識上而言，這意味著一種觀念或經驗總是對照著另一種觀念或經驗，因而使得二者有時以新穎、不可預測的方式出現：從這種並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關如何思考的看法……

知識份子流亡的立足點第二個有利之處，就是比較能不只看事物的現狀，而能看出前因。視情境為機緣的 (contingent)，而不是不可避免的；視情境為人們一連串歷史選擇的結果，是人類造成的社會事實，而不是自然的或神賦的 (因而是不能改變的、永恆的、不可逆轉的)。²²

薩氏的觀點正好有助於讓我們辨識蔡琰在中國歷史上獨特的「知識份子」身分，正因為她放棄了純粹正統的、與政治核心依違拉扯的知識份子角色，反而可以客觀地實行知識份子的責任，抉發社會問題、提出不受任何政治勢力干擾的見解。

²² 艾德華·薩依德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頁 96-98。

參、「遊」：離鄉與歸鄉之途

前文討論了班彪、王粲、蔡琰各不相同的知識份子處境、政治與文化認同，下文將就其作品進一步探索。

由於三人都在詩文裡留下亂離的經驗，作品所記載的流離道途其實正反映出他們對此一經驗的反思。我們可以說，這些記敘或追懷，藉由見聞的取捨、描繪、評論，點出他們各自的認同對象和認同標準。但是，或許可以更進一步推論，言語辭章中的山川道路，很可能是他們賴以取捨與調適的過程，也可能是已有定見之後進行自我詮釋的方式。

于浴賢認為紀行辭賦遠承屈原〈涉江〉、〈哀郢〉，其結構形式經由劉歆（約 50 B.C-23 A.D.）〈遂初賦〉遞轉，以「述道路征行，抒懷敘志為其共同的内容結構特點。至此，兩漢紀行賦題材内容的基本形式得到確定。」²³歸納〈北征賦〉、〈初征賦〉、〈悲憤詩〉二章，確實可以發現紀行作品（包括辭賦與詩）具有共同的基本架構，將行旅依序分為三個主要部分：1.事由；2.行遊之途；3.景物與情感。雖然作者對各個部分的著墨比重不一，所描述的内容與表現手法也有差別，然而基本架構大致互相吻合。所不同的，在於〈北征賦〉和〈初征賦〉一離鄉、一歸鄉，所記都屬單向的行旅，〈悲憤詩〉則包括其後的歸返之旅，楚辭體寫到啟程歸鄉的時間點，五言體則更將時間延長推展到返抵國門之後數年，以追述往事的口吻，將往返兩段路程重疊類比，就行程而言是首尾相啣的，就各主要部分的組成方式而言則是對稱並列的，因此，無論「離鄉」或「歸鄉」，其基本架構仍然相同。以下即針對事由、行遊之途、景物與情感三個部分，比較各篇作品的細節與表現手法。

²³ 于浴賢，〈六朝紀行賦繁榮之鳥瞰〉，南京大學中文系主編，《辭賦文學論集》（南京：江蘇教育，1999年），頁386-387。

一、事由

前文已經提及，就班彪、王粲、蔡琰三人的實際遭遇而言，皆因為戰亂而流離，並且最終都歸返故土。然而，縱使生命中皆有往返交織的旅途，只要所前往之地、往返的情境稍有差異，就足以造成相異的認同對象與認同標準。當然，認同對象與認同標準的選擇、確認，也決定了作者將如何述旅紀行。三人的流離背景既是如此相似，皆因戰亂而離開京城、又回到京城，旅途的開展自始就處在時代陰影的籠罩下，因此，對於行旅的起因，三人皆歸之於「世」之不平。

在班彪看來：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災。舊室滅以丘墟兮，
曾不得乎少留。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跡而遠遊。²⁴ (頁 255)

至於王粲則是：

違世難以迴折兮，超遙集乎蠻楚。逢屯否而底滯兮，
忽長幼以羈旅。賴皇華之茂功，清四海之疆宇。(頁 665)

蔡琰的楚辭體〈悲憤詩〉亦無二致：

嗟薄祜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
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²⁵

²⁴ 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255。
本文所引班彪、王粲賦作皆出自此書，以下徵引時僅於引文後括號標示頁碼，不另加註。

²⁵ 北京大學中文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臺北：里仁，1992年），頁160。
本文所引蔡琰〈悲憤詩〉兩首，皆出自此書，以下徵引時僅於引文後括號標示頁碼，不另加註。

個人的流離失所都是因為世事的紛擾，家破人亡，因而主動或被動地離開故地，其中，班彪與王粲之去京，相較於蔡琰之被擄入胡，似乎是幸運得多、主動得多；但是，同樣在戰亂風雲襲捲下，「逃難」也是不得不然的選擇。知識份子、士大夫一旦遭逢戰亂，去與留就不僅僅是關乎個人情志的仕隱抉擇，而是與黎民百姓一般無二的生死交關。其中王粲與班彪又有不同，班彪出亡的行程正要開始，王粲卻踏上歸返之途，於是，班彪在一片喪亂破亡中走出，接下來的行旅必須試圖恢復他的士大夫身分；王粲已經脫離生死關頭，完成出仕的選擇，此去途上就是在逐步恢復一個得所任用的士大夫意識。至於蔡琰，離亂伊始即陷入一種完全的被動狀態，被擄西行，生與死始終難以預料。正是這些處境的差異造成後文記敘行旅的不同方式。

值得繼續討論的是，在五言體〈悲憤詩〉一開始，就不以個人的遭逢亂離為事件重心，直接擴大，戰亂的體驗乃是所有人民因為士大夫的爭權奪利而痛苦承受的共同災難：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竄弑，先害諸賢良。
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
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士人脆弱，來兵皆胡羌。
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殲無子遺，屍骸相掌拒。
馬邊縣男頭，馬後載婦女。(頁 153-154)

前文提過，蔡琰此處能夠以不同於一般士大夫的單一視角，議論時事，並不避諱同時批判權臣與士人。對蔡琰而言，她在亂離中的位置始終都在黎民百姓之間，沒有機會及早逃難，直接承受了政權瓦解之後的生死塗炭，所謂「馬前縣男頭，馬後載婦女」，蔡琰自己其實就處身馬後所載婦女之列。柯慶明先生區別楚辭體與五言體，指出「從創作的意圖上看，顯然五言體的旨在敘『亂離』，因此著重在述其始末的『敘事』；楚歌體

的卻意在抒『悲憤』，所以偏向於觸景興感的『抒情』。」²⁶五言體對亂離事由的敘說與評價，即在呈現蔡琰的回憶，此一回憶被放置在集體而非個人之下，雖然史傳仍以知識份子的價值觀肯定蔡琰，然而就蔡琰本身來說，她已經選擇了庶人的位置，成為原來所屬主流知識階層中的邊緣者。

然而，五言體〈悲憤詩〉中亦有歸返的旅程：

邂逅微時願，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
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
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
阿母常仁惻，念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
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
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
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觀者皆唏噓，行路亦嗚咽。(頁 157)

不同於王粲的歸返，屬於士大夫選擇心目中的明主雄君而出仕，蔡琰的歸返仍然帶有幾分不得已。被擄向西乃是忍辱之旅，而此番東歸卻是含辱之行。楚辭體也寫到歸返的事由，然而更強調歸返啟程的片刻「心怛絕兮死復生」：

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
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營營。
頓復起兮毀顏形，回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頁 161)

²⁶ 柯慶明，〈苦難與敘事詩的兩型——論蔡琰「悲憤詩」與「古詩為焦仲卿作」〉，《文學美綜論》（臺北：長安，1986年），頁 87。

柯慶明先生已經指出這是孝與慈兩種情感與價值的掙扎兩難，²⁷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孝與慈的兩難同時也是往日與未來、根源與發展的矛盾糾結。蔡琰選擇了父母之邦，一方面可能如蔡瑜先生所言，乃是缺乏充分資訊、可以衡量輕重、自我負責的「理性抉擇」，「她的歸漢只是一場政治角力與權力交涉，既以證明曹氏政權的威望，也所以說明邦誼的意義凌駕一切」²⁸。然而，雖則政治權力的運作確實存在，蔡琰的抉擇卻也不見得是非理性的。就一個母親的立場，面對子女的哭泣、撲跌、受傷流血，這樣的場景只怕才是理性難以克服的，當下總不免「當發復回疑」。對蔡琰而言，歸漢是「己得自解免」的選擇，只不過這個選擇必須同時面臨另一次的天倫永隔。無論蔡琰是否充分獲得故鄉的資訊，對她來說，所謂「家」，自始至終都是指向漢地，雖然她放棄了知識份子的角色，卻不必然要同時放棄身為華夏人的角色，歸漢的選擇不但是傳統中國孝大於慈的價值觀，同時也表述出她對文化的取捨：所認同的是己身文化的根源，而不是後來遭逢的新文化、異文化。

二、行遊之途

谷口洋以宗教思想的角度討論戰國至秦漢賦作的遊行主題，其中，〈九辯〉繼承〈離騷〉，形塑出賢人失志的孤獨感，是「『遊行』主題所含的神怪與悲哀的精神化、純粹化」，²⁹此後，「《九辯》中所看到的悲哀感情的純粹化，也一直在進行。在騷體賦中，主人公的憂苦由遊行的形象來表現，……還有班彪《北征》、班昭《東征》等『紀行』賦也屬於這

²⁷ 柯慶明，〈苦難與敘事詩的兩型——論蔡琰「悲憤詩」與「古詩為焦仲卿作」〉，《文學美綜論》，頁 92。

²⁸ 蔡瑜，〈離亂經歷與身分認同——蔡琰的悲憤交響曲〉，性別／文學研究會主編，《古典文學與性別研究》，頁 86。

²⁹ 谷口洋，〈試論早期辭賦中的神怪與悲哀——從「遊行」主題看戰國秦漢宗教情感的蛻變〉，南京大學中文系主編，《辭賦文學論集》，頁 107。

一類。」³⁰此處指出文學作品中的「遊」，一方面是行旅的紀錄，另一方面則是行旅者內在意識的發顯。行旅是在時間推移中逐步跨越空間，紀行類文學作品的閱讀也正提供類似的經驗，以時間喚取空間。同時，因戰亂而生的行旅流離，對時間與空間的感懷和經營方式，就與其他紀行之作大不相同，行旅者的內在意識將不斷被「戰爭」或「國破家亡」這樣龐大恐怖的陰影所牽掣。

前文曾經述及班彪的北征行旅，處於對未來惶恐無知的階段，在世難中倉促出逃，於是旅途中必須不斷召喚自己原有的知識份子意識。我們看到他一路向西北行去，所記述的都是帶有歷史意義的特定地點，並且不斷地以這些空間追溯、聯繫歷史，在空間與時間的融合中呼喚出個人的政治觀點：

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鄉。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紛吾去此舊都兮，駢遲遲以歷茲。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為期。涉長路之綿綿兮，遠紆回以繆流。過泥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不脩。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日奄奄其將暮兮，睹牛羊之下來。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劇蒙公之疲民兮，為彊秦乎築怨。舍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顧厚固而繕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侃。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脈而生殘。登障隧而遙望兮，聊須臾以婆娑。閱獯鬻之猾夏兮，弔尉邛於朝那。

³⁰ 谷口洋，〈試論早期辭賦中的神怪與悲哀——從「遊行」主題看戰國秦漢宗教情感的蛻變〉，南京大學中文系主編，《辭賦文學論集》，頁 111。

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他。
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淠之逆邪。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
(頁 255)

他從周朝興起之地對比當下自己的處境，千數年前自此崛起的周人，何生之優渥，而今日自己卻是因為「獨罹此百殃」而行經此地。在這種對比之下獲得的結論正呼應全文開頭時的「世難」：所謂「世難」即是「時會之變化」，天命其實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所針對的不是任何個人，而是整體時勢的抉擇和變易。於是，作為知識份子，他自信言行並無失當，同時也因為身為知識份子，遂有以歷史臧否當下的責任。於是，後文結合周以下歷史與自己作為知識份子的處境與批判意識，對戎王之「忿」、對宣后之「穢」、對秦昭之「嘉」，都藉由時間與空間、行旅與歷史表現知識份子的自任自許，「日晡晡其將暮兮，睹牛羊之下來」，即已暗暗點出〈北征賦〉全文「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的主題。

班彪又將「君子行役」擴大為帝國領土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從過往的民族互動歷史中，為自己當下的行旅試做詮解。這種國際關係的討論從秦到漢，一方面為漢政權建立起其合乎時會變化、順乎天命之常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班彪在此所行之路，基本上沿著長城，於是不斷地意識到長城裡外的區別。長城既然作為民族、國家的邊界，沿長城西行，就等於處身在兩種文化的夾縫間。對班彪來說，陷入大亂的京師能否復興再起，復興再起的是否為他所眷戀仰思的漢政權，皆不可知；此行不但在地理上與京師漸行漸遠，在政治與文化意義上也可能成為一個巨大的轉折。文化差異與政治分裂的對照，凸顯出班彪此刻的抉擇情境：在文化上他毫無疑義地以華夏為宗，然而在政治上是否也能持續認同舊有的正統？時會變化，天命之常是否已經做出新的選擇？班彪雖有強烈的知識份子使命感，但是在世衰道危、群雄並起之際，

歷史正統真的是一個延續不絕的價值嗎？歷史不也同時很清楚地宣告了，沒有什麼王朝是恆久不變、無可取代的？

相較於班彪在旅途上的猶疑惶恐，循著作為臨界點的長城掙扎思索，王粲的〈初征賦〉則走在平敞寬闊的大道上。空間與時間都被輕易跨越：

超南荊之北境，踐周豫之末畿。野蕭條而騁望，路周達而平夷。
(頁 665)

王粲對空間的描繪完全以現實的政治勢力為準，從「南荊之北境」到「周豫之末畿」，逐步向政治核心靠近，不但是歸鄉之旅，也是獲得賞接知用的仕進之途。從「超」、「踐」二字可以看出他對兩個政治力量的選擇，以及對自己所作選擇的感受和詮釋。離開南荊正是超脫出過去在劉表政權下的不遇之憾，一旦踏上真正的周豫中原，即使只是外圍（這可以同時指向地理上的外圍與政治上的外圍）位置，都能帶來篤定踏實的滿足感。尤其，相對於班彪危疑難安的長城，也相對於〈登樓賦〉中「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迴兮，川既漾而濟深」的隔絕夔遠，此時的北行道途可以輕易地跨越空間，原有的阻隔都因為政治選擇而不復存在，蕭條騁望、平夷周達。對王粲而言，此刻所歸返的京師已非當時亂無象的京師，不但是一個更加強勢有力的政權，同時是自己得以獲得任用的士人環境。他對知識份子的價值判斷、對政治認同的取捨標準，都疊合在個人的遇與不遇一點上，「遇」不但彰顯了自我的價值所在，同時也被等同於判斷一個政權是否具備合法性的關鍵。

至於〈悲憤詩〉對行遊之途的描寫，也可由柯慶明先生所言「楚辭體抒情、五言體敘事」的觀念加以把握。兩篇都著意描寫途中的流離實

況，然而楚辭體重在以個人遭遇表現撕裂的情感，寫個人的寢食難安、身心俱疲：

山谷眇兮路漫漫，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
饑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皆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
雖苟活兮無形顏。(頁 160)

這條西行之路，無論就實際情況或就象徵意義來看，都充滿危險與折磨。山路險峻漫長，行走之際必然帶來疼痛艱苦，而遠離父母之邦的苦痛亦復如是。寢食不安、淚流不止，牽涉到的不但是離鄉背井的悲哀，同時也是被擄入胡、未能守節死難的知識份子之痛。楚辭體為了強化抒情瞬間的力量，將所有的掙扎繫於個人身上，以生理的折磨聯繫心理的折磨，點出面對知識份子之道德標準時的依違兩難。

相較於楚辭體以個人情感描寫旅途，將大部分的篇幅保留給胡地，由胡地風物寫出與故土遠隔之悲，五言體則充分敘述路途所見，雖無景物，卻呈現出百姓亂離的實況。

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為爛腐。
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
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極杖，毒痛參併下。
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
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頁 154)

此處呈現了被俘虜之群眾的共同命運，親人不得相認，再無寢食難安的困擾，因為生死的問題比寢食之安穩更加迫切恐怖。在五言體〈悲憤詩〉中，蔡琰所面對的不再是志節有虧的知識份子困境，而是作為戰場內的黎民百姓，隨打隨殺，「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如同草芥一般毫無

選擇權。政治的亂局並不是這些黎民百姓造成的，董卓把持宮廷，海內義師掀起戰爭，朝臣與知識份子的爭鬥抗衡竟然都由平民承擔其苦厄，於是從作為生民、遭臨無妄之災的切身經歷，發出「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之問，正是蔡琰放下知識份子認同感的關鍵契機。

此外，五言體還多出歸鄉一段的旅途可為對照：

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
念我出腹子，胸臆為摧敗。(頁 158)

蔡琰的歸鄉之途與王粲截然不同，乃在於他們對所歸之地的認同方式、認同標準已經有異。王粲是以個人仕途之正式開啟、獲得知識份子所嚮往的參與朝政之機會，因而雀躍狂喜；蔡琰則是以對文化根源的認同感而回歸，就其個人而言，卻必須承擔至親肉肉的再度離散訣別。於是「悠悠三千里」，所象徵的不再是與華夏政治核心的距離，而是情感的阻斷割捨，隨著時日與旅程的推進而愈深愈長。

三、景物與情感

最後要討論的是，行旅途中的景物如何與行旅者內在情感結合，呈現各自不同的內在處境。

前面已經討論過班彪面對時局，產生如何判斷一政權之正確性的猶疑，〈北征賦〉的寫景也帶有此種對未知的惶恐：

躋高平而周覽，望山谷之嵯峨。野蕭條以莽蕩，迴千里而無家。
風森發以漂遙兮，谷水灌以揚波。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
雁邕邕以群翔兮，鷓鴣鳴以嘒嘒。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恨以傷懷。
撫長劍而慨息，泣漣落而霑衣。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

夫何陰暄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諒時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愬。(頁 255-256)

惶恐的根源即在於眼前蕭條莽蕩，卻千里無家的無根之感。意識到未來的漫漫長路都不具有「家」的歸屬感，當他沿著長城走到不再具有歷史意義的荒野，這樣的空間不但有實際的莽蕩蕭條，還因為頓失歷史後盾而落實了原來的恐慌。於是，此處寫景都在強調動盪不安與懵昧昏茫。知識份子向來活在充滿歷史隱喻的環境中，一旦走到歷史的盡頭、走到歷史也未曾抵達之地，就只能依憑孤單飄零的自己做出選擇。這種對於歷史的失落感，正好解釋了知識份子面對改朝換代的危機感：時代的改異若有歷史憑藉，即可以確立其正統性、合法性，否則陷入覆亡、被其他政權取而代之。當班彪還在具有歷史意義的空間中行旅時，他必須不斷衡量歷史與時會的交互作用，此刻雖失去歷史依憑，卻同時可以直接思考生民何以多故，直接展開知識份子的當下責任。景況之「陰暄之不陽」，原因在於「久失其平度」，眼前景物的昏濛狀態同時向班彪揭示了久已窳敗不堪的政治現實。這些混亂破敗，並不是歷史所造成、也不是天命，而是「時運之所為」，是王莽以來種種政治上的舉措失當，唯有回歸歷史，才能解除伊鬱其長、無可傾訴的困頓狀態。

於是，班彪因為行旅而經歷了政治認同的反省思辯，乃能獲得結論：

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頁 256)

本來沿著長城、憂懼著渾沌不明的未來，如今則重新認知識份子的價值，雖因時局而有遇與不遇、有屈有伸，然而孔子已然確立了知識份子

的典型，在窮困之中以六藝文史的歷史文化教養涵泳自得，如此則「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至於王粲的〈初征賦〉，不但如前文所述，可以為政治認同的一致而輕易跨越了地理空間的阻隔，同時，從景物的描寫來看，也可以發現其中所透露的喜悅歡暢：

春風穆其和暢兮，庶卉煥以敷蕤。行中國之舊壤，實吾願之所依。
當短景之炎陽，犯隆暑之赫曦。薰風溫溫以增熱，體曄曄其若焚。
(頁 665)

廣泛的說，「行中國之舊壤，實吾願之所依」，亦為班彪、蔡琰，乃至所有流離失所的中國知識份子共同的想法。此處值得注意的是王粲以時間統攝景物，藉由季節的改變傳達對個人現況的感受。照理說來，王粲此時由南往北，氣溫不應越行越高，然而他仍強化由春至夏的季節遷變，風物諧美、花蕤日暖。所謂「炎陽」、「薰風」，不但是外在實景的刻畫，同時也是對曹氏政權的歌詠頌讚，並且以「體曄曄其若焚」進一步將景物與政治內化為自己的一部分，充分表示了對自己的選擇滿腔歡喜、如願以償。³¹

最後也是最為複雜的〈悲憤詩〉。楚辭體對景物的描繪集中在胡地，並且強調所帶來的駭異恐怖之感：

惟彼方兮遠陽精，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獸兮食臭腥，言兜離兮壯窈停。歲聿暮兮時邁征，

³¹ 關於王粲的政治認同與其後作為曹氏父子文學侍從之臣的相關討論，可參看法國漢學家桀溺 (Jean-Pierre Diany) 的〈閱讀王粲〉。其中由曹植 (192-232)、阮瑀 (?-212)、王粲三人的三良詩進行比較，認為阮瑀、王粲是「站在忠臣的立場來稱讚這種無條件的服從並同時含蓄地表白他們對曹氏的忠誠不二。」樂黛云、陳珏、龔剛編選，《歐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南京：江蘇人民，1998年)，頁 140-145。

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寢兮啟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胸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頁 160-161)

不但胡地景物冥漠荒寂，胡人胡俗亦令人怖懼不已。索羅爾曾討論馬克·吐溫 (Mark Twain) 的小說《亞瑟王朝廷上的美國佬》，書中主角從美國回到亞瑟王時代的英國，經常使用動物異象比喻當地人民，其中不但有兔子、驢子，甚且還包括蟒蛇、蛤蚌、蝙蝠、老鼠等等，另外也比喻為木偶、物品、香腸肉等無生物，以「非人性化」建構族群的分界。在索羅爾的討論脈絡裡，「種族界線的建立是一個一般性的過程，它試圖無視一個基本事實，即所有的人——雖然外表迥異——至少就作為人而言，都是一樣的。擁護分界的語言策略將其他人同發言者疏離如此之遠，似乎他們根本就不是人而是其他物種（結果是在作品中往往出現動物意象）。他們被定型為幼稚、迷信、野蠻、骯髒或無知。」³²然而從楚辭體〈悲憤詩〉來看，驟然置身於一個全然陌生的異環境中，成為一個絕對的他者，對當地種種風俗難以適應，並不是蔡琰有意將胡人視為野蠻生物，而是先前慘酷的屠戮經歷與來到胡地的第一印象，讓她確實難以承受民族文化的巨大差異。於是，胡地景物可以總結為「夜悠長兮門戶扃」的黑暗與阻絕之感，縱使啟屏營、臨廣庭，戶外仍然是一片玄雲遮蔽星辰，毫無光亮與希望。胡笳、邊馬、孤雁，乃至樂人的琴箏，一再強化了當下空間的殊異失常，景物的蔭翳遮蔽使種種情緒難以發抒，邊塞之聲又為此一空間的閉鎖感衝開一道關口。

³² 維爾納·索羅爾，〈族群〉，弗蘭克·蘭特里夏、托馬斯·麥克勞林編，張京媛等譯，《文學批評術語》，頁 413；相關討論則包括頁 413-418。

在楚辭體〈悲憤詩〉中，蔡琰的角色相對於似獸、食臭腥、言兜離、狀窈停的胡人，以絕大的差異標示出自己的不同身分，表明了對漢家文化的認同感，並接續其前的志節死難之念，使此一認同更為鮮明強烈。然而，在這種自為他者的決心之後，卻是歸返京師之前的與子訣別。這樣的處理似乎為知識份子的認同感投下一個問號：真的可以在一個文化環境中成為完全的他者嗎？蔡琰與胡地胡俗之間，永遠以骨肉至親作為聯繫，難道知識份子的身分認同感足以勝過母子之情？此一問題要由五言體〈悲憤詩〉的另一種取捨方式解答：

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
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
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頁 157）

在楚辭體中恐怖如異類的胡人胡俗，到了五言體就輕描淡寫地歸諸於「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當地的人情其實並不恐怖，只不過與華夏民族「有異」而已。因為承認「有異」，接受這樣的差異，於是可以將自己安頓在民族與民族的裂隙中，心中有漢，卻不必排胡拒胡。對差異的描寫不再「非人性化」，逐漸以更開闊的眼光互相看待。楚辭體中的「陰氣凝兮雪夏零」轉變為「處所多霜雪」，「北風厲兮肅泠泠」增加了「翩翩吹我衣」的和緩，至此，「異常」被接受了，僅只是一種以往不常見的自然情狀而已，蔡琰遂能在文化差異間接受當下的新生活。

然而，繼續比對五言體對返抵家門的景物描寫，更可以看出其認同的取捨考量：

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
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
粲粲對孤景，怛吒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

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為復疆視息，雖生何聊賴？
託命於新人，竭心自鬻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
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頁 158)

對於此時的蔡琰來說，恐怖的反而是原來尋常無殊的故國故鄉，「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的慘況，較之胡地，尤令人驚懼。同時，正因為這是應該無異的往昔空間，卻成為最大的歧異和裂變，更是難以承擔。此外，景物全非的故鄉，連昔日人事都不可尋，異文化的胡地猶有血親，文化之認同對象卻再無血緣與人倫關係。於是當蔡琰登高遠眺，不免也要對當下的華夏舊居感嘆「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此時，她真正放下了大漢知識份子的驕傲，轉而尋求庶民的價值：確保生命安全、維繫家族關係。而有限人生裡長相左右的終生之「憂」，也就成為作為邊緣者之知識份子的恆久流亡，永遠無法觸及真正的、令人安心的故鄉。

肆、結論

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由班彪、王粲、蔡琰的抉擇看出東漢知識份子面對戰亂流離的方式，以及其間尋求認同的幾種取向。簡單地說，他們表現出知識份子的三種形式與三種選擇：班彪可能最符合中國對知識份子的傳統要求，以歷史傳承決定政治認同，並且堅持不屈。王粲在某些嚴苛的定義下，可能會被歸為一般文人，而非知識份子，然而他所接受的畢竟是傳統知識份子的教育，是在這樣的教育下發展出來的自我，將遇與不遇、仕與隱視為人生最重要的選擇與價值，並以個人的遇與不遇決定政治認同的對象。蔡琰雖然在後世頗有褒貶異辭，然而就六

朝以前史傳觀察，畢竟還是將她視為知識份子³³，反而是蔡琰本人，在知識份子與庶人價值之間婉轉徘徊，依違取捨，一方面放下了知識份子的政治認同，一方面又針對知識份子的文化認同，結合庶民百姓的經歷，在永遠流浪無歸的內在情境裡，成為知識份子群體中深具批判力的邊緣者。

其次，就三人以文學作品傳達的認同方式來看，普遍出現的「吾土」當然具有固定的象徵意義，屬於漢代知識份子共同的文化語境，然而士人如何歸向吾土，所歸向之「吾土」實質面貌如何，更值得深思。在亂離之下，歸返的意志與結果縱使相同，其過程卻透露了更複雜的訊息，乃是知識份子與時代／時局／時勢的角力。班彪藉由對旅程的描繪釐清、呈現自己獲致認同感的過程；王粲以旅程的書寫說明自己的認同；蔡琰則在流離往返的回憶裡一再選擇、放棄，最終卻意外符合了當代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薩依德等人關於知識份子的嚴苛定義。³⁴因此，或多或少，對於家國或文化認同的取捨結論，都決定了他們處理、對待離亂中之「遊」的方式，我們也從「遊」的過程、「遊」的書寫，看出東漢知識份子可能的幾種自我詮釋途徑。

進一步說，漢代是中國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長治久安的政權，相對於前此的周、秦，知識份子的處境和定位都有不同。加以尊儒與治經的文化養成，可以說是所謂「中國知識份子」紹述孔子、在理論與實踐雙雙奠定基礎的時期。承平之時通經致用，然而面對亂離，所有的認知

³³ 值得注意的是，唐章懷太子李賢注《後漢書》，仍標舉蔡琰精通音律的例子，同時，被斷為唐人偽作的〈胡笳十八拍〉，可以視為後人對蔡琰的理解與詮釋，仍然視之為滿腔悲鬱、忍辱求歸的知識份子。如果根據孫康宜之說，「最早具有自傳色彩，而真正能稱得上見證亂離的詩篇則是女詩人蔡琰的作品」，則表演性格強的〈胡笳十八拍〉接近於他人講說的他傳詩。見孫康宜，《文學的聲音》，頁42。

³⁴ 葛蘭西之說參見艾德華·薩依德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

架構與文化教養面臨考驗，在考驗中尤其可以看出這些理論與實踐所能發揮的作用。亂離之中，班彪、王粲、蔡琰又各具生命經歷，透過紀行之作展現他們的認同歸趨，以及陳述、思考此一認同歸趨的方式。在此之後，三國騷亂，知識份子面對的時勢越趨複雜，內在辯詰更加多元，更有魏晉的自然與名教之辨。在這些演變轉折之先，班彪、王粲、蔡琰，或可作為最基本的模式與型態，有助於觀照往後知識份子的啟變與行易。

徵引書目

(一) 古籍

漢 Han · 王粲 Wang Can, 《王粲集注》 *Wangcan jizhu*, 吳云 Wu Yun、唐紹忠 Tang Shaozhong 集注, 河南[Henan]: 中州書畫社[Zhongzhou Shuhuashe], 1984 年。

西晉 Xi Jin · 陳壽 Chen Shou, 《三國志》 *Sanguo Zhi*, 臺北[Taipei]: 世界書局 Shijie shuju, 1985 年。

南朝宋 Nanchao Song · 范曄 Fan Ye, 《後漢書》 *Houhan shu*, 臺北[Taipei]: 鼎文[Dingwen], 1977 年。

(二) 近人編輯、論著

北京大學中文系 Beijing daxue zhongwenxi 編, 《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 *Wei jin nanbeichao wenxueshi can kao ziliao*, 臺北[Taipei]: 里仁[Liren], 1992 年。

費振剛 Bi Zhengang、胡雙寶 Hu Shuangbao、宗明華 Zong Minghua 輯校, 《全漢賦》 *Quan hanfu*, 北京[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 daxue chubanshe], 1997 年。

性別／文學研究會 Xingbie/wenxue yanjiuhui 主編, 《古典文學與性別研究》 *Gudian wenxue yu xingbie yan jiu*, 臺北[Taipei]: 里仁[Liren], 1997 年。

弗蘭克·蘭特里夏 Frank Lentricchia、托馬斯·麥克勞林 Thomas McLaughlin 編, 張京媛 Chang Jingyuan 等譯, 《文學批評術語》 *Wenxue piping shuyu*, 香港[Hong Kong]: 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年。

- 孫康宜 Sun Kangyi,《文學的聲音》*Wenxue de shengyin*, 臺北[Taipei]: 三民書局 San Min shuju, 2001 年。
- 艾德華·薩依德 Edward W. Said 著, 單德興 Shan dexing 譯,《知識份子論》*Zhishi fenzi lun*, 臺北[Taipei]: 麥田[Maitian], 1997 年。
- 南京大學中文系 Nan Jing University zhongwenxi 主編,《辭賦文學論集》*Cifu wenxue lun ji*, 南京[Nanjing]: 江蘇教育[Jiangsu jiaoyu], 1999 年。
- 柯慶明 Ke Qingming,《文學美綜論》*Wenxuemei zonglun*, 臺北[Taipei]: 長安[Changan], 1986 年。
- 樂黛云 Yue Daiyun、陳珏 Chen Jue、龔剛 Gong Gang 編選,《歐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Ouzhou zhongguo gudian wenxue yanjiu mingjia shinien wenxuen*, 南京[Nanjing]: 江蘇人民[Jiangsu renmin], 1998 年。